

热点 点击

1月份对外直投同比增18.2%

流向制造业投资增长近九成



本报北京2月16日讯 记者冯其予从商务部获悉：2016年1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20.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实现良好开局。

据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介绍，1月对外投资呈现出几方面鲜明的特点：流向制造业的投资增长快速、跨年度并购项目交割活跃，以及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热情不减。

据悉，今年1月份，流向制造业的投资16.2亿美元，同比增长87.8%，主要流向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医药制造、金属制品制造、汽车制造业等。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的投资8.4亿美元，占制造业投资的51.9%，同比增长128.3%。

跨年度并购方面，2015年11月，三峡集团在巴西圣保罗证券交易所进行的公开竞拍中，以138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成功获得了巴西朱比亚水电站和伊利亚水电站30年特许经营权。今年1月5日，两座水电站特许经营权项目正式完成交割。交易完成后三峡集团在巴西控股和权益装机容量达到600万千瓦，一跃成为巴西第二大私营发电企业。

此外，在2015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创下历史新高基础上，今年1月份对美投资15.6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3.9倍，同时正在开展的并购项目金额也超过百亿美元，如海尔股份公司54亿美元收购通用电气家电业务、大连万达集团35亿美元收购好莱坞传影业等。

目前，我国对外投资流量已居世界第3位，存量位居世界第8位，不仅为驻在国创造了就业和税收、推动了相关产业转型升级、改善了基础设施条件，也为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实现共同发展、深化双边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

交通改革瞄准服务能力提升

“运行一张表、出行一张票”不再遥远

本报北京2月16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今日表示，2016年将紧紧围绕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推进交通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交通运输供给服务能力和水平，更好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十二五”是我国交通运输发展最快的5年。数据显示，“十二五”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总投资约12.5万亿元，是“十一五”总投资的1.6倍。我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及港口深水泊位数量，均位居世界第一。

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推进交通结构性改革。系统分析新常态下交通运输需求的深刻变化，深入研究推进交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适应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业态模式和新的市场需求，进一步推动交通与经济联动融合，全面提升交通运输供给服务能力和水平，更好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有关部门将以“一平台、一枢纽、三系统”为重点，全面提升交通效率和质量。打造综合交通规划建设运营大平台，推动实现“规划一张图、布局一张网、运行一张表、出行一张票”。同时，在综合枢纽衔接、城际交通建设、推广联程联运、发展智能交通、提升快递服务、支撑服务消费、绿色安全发展等7个方面，推动实施交通运输提质增效百项示范工程。

观点 声音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车伟：

应提高劳务类个税起征点

本报北京2月16日讯 记者苏琳报道：在今天举办的“2016年经济形势座谈会——聚焦：新常态、新改革、新发展”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表示，应对个人所得税实施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劳务类的起征点，减轻劳动者负担，“放水养鱼”。

张车伟认为，在劳动报酬份额偏低、劳动者工资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劳动者拿到的收入被进一步拿走的比例不断上升。个人所得税3%、住房公积金6%、个人缴纳的社保4%等等，整个加起来，劳动者本来应该拿到的工资当中有26%变成了不可支配收入。

为此，张车伟建议，个税改革当务之急是要解决税制的公平性问题。尽快实施个税分类征收，劳务类、经营类、财产类等。在分类征收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劳务类报税起征点，以减轻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负担，同时加强对真正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

他还表示，个税改革要在劳动报酬份额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推进，劳动报酬份额提高是我国经济转型和供给侧改革及提升内需的关键。

本版编辑 胡文鹏

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携手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

重点工业领域迎来金融“及时雨”

本报记者 陈果静

观点

农历新年伊始，工业企业就迎来了一场“及时雨”。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打出的金融组合拳，有利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有利于企业转型升级，也有利于工业供给侧改革。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出台的政策，特别强调了信贷政策的差异化，将为鼓励优势产能、挤压过剩产能提供良好金融环境——

2016年首套金融“组合拳”聚焦工业。近日，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八部门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从加强货币信贷政策支持、提高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支持力度等6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支持工业的具体金融政策措施。

业内专家认为，《意见》的出台增强了金融对工业企业的支持力度。尤其是此次强调的落实差别化信贷政策等，将引导金融机构适应工业转型升级的新变化，避免“一刀切”。同时，强化风险防范，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将为工业转型升级、降本增效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重点支持工业和制造业

“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首先要支持工业和制造业。”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透过去年全年的数据也能看到，工业和制造业的相关数据持续下行，一方面，这是转型升级阵痛期的正常表现，另一方面也要正视工业领域遇到的困难。

2015年，工业经济增速回落的同时，利润也在下降。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3%，其中重要原因是成本居高不下、流动资金紧张。

因此，《意见》强调，加强金融对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持。“通过对符合发展方向的领域和行业以及企业走出去和兼并重组做‘加法’，对产能过剩和落后行业做‘减法’，将推动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确保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的实现。”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

在宏观政策方面，《意见》提出，要综合运用多种流动性管理工具，保持流动性水平适度和货币市场稳定运行，引导货币信贷平稳增长。同时，针对金融机构，《意见》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对企业兼并重组、不良资产处置的力度和效率，积极稳妥推进工业化过剩产能和库存等。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提出要通过推进资产证券化，特别是探索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支持银行核销以及多种方式化解不良贷款，保护银行债权等。温彬认为，银行信贷是工业顺利运行的血液，在保障银行自身安全运行的情况下，这将有利于提高银行支持工业转型升级的积极性。

信贷有保有压有扶有控

落实差别化工业信贷政策是《意见》

中的一大亮点。“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随着不良贷款的持续上升，金融机构容易产生风险厌恶的情绪，容易‘一刀切’‘错杀’好的企业。”连平表示，工业和制造业的客户是银行最重要的客户之一，但目前对于这一领域信贷的投放越来越谨慎，需要政策加以引导。

《意见》指出，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对钢铁、有色、建材、船舶、煤炭等行业产品有竞争力、有市场、有效益的优质企业继续给予信贷支持。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新增产能建设项目，一律不得给予授信；对长期亏损、失去清偿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僵尸企业”，或环保、安全生产不达标且整改无望的企业及落后产能，坚决压缩退出相关贷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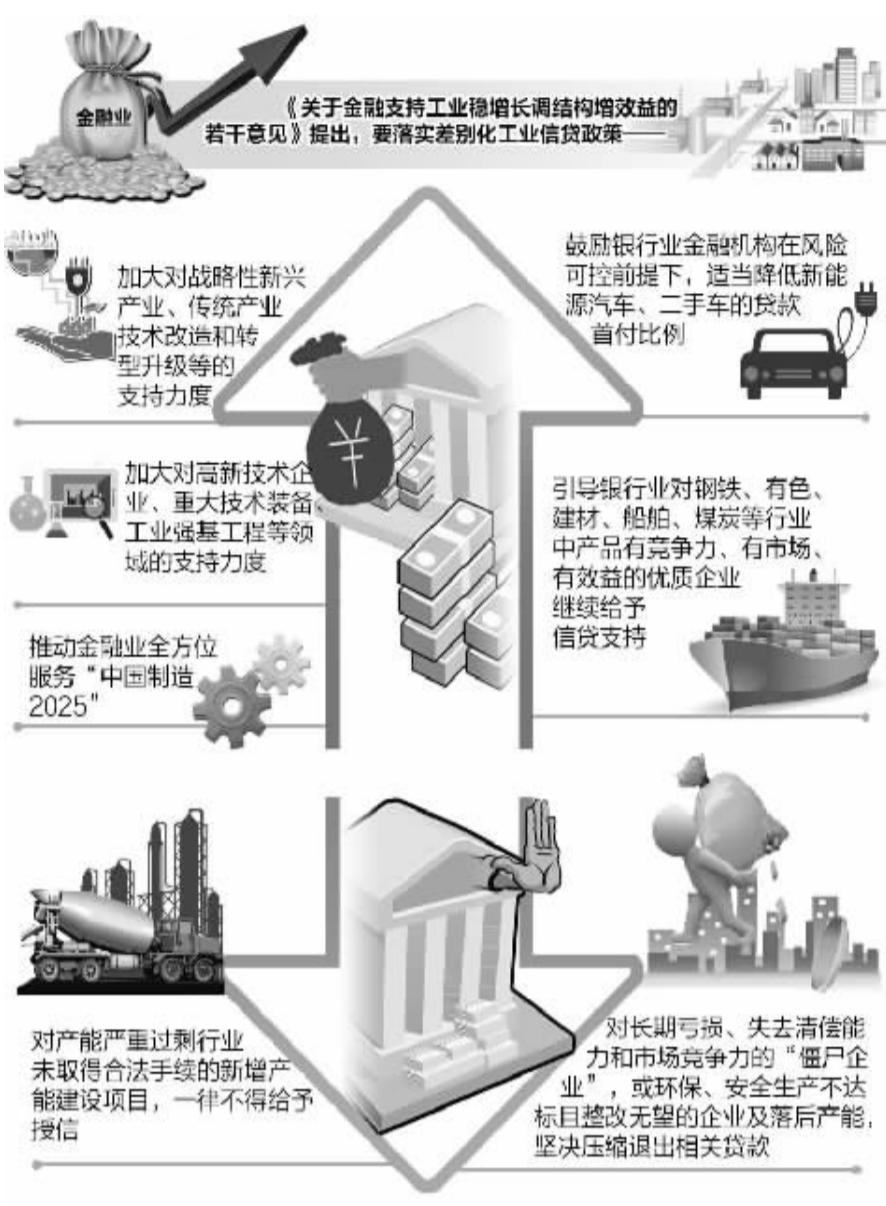
连平认为，这一方面是让金融机构适应变化。当前，我国工业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金融机构需要适应这种变化，更有针对性地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转变观念，要认识到产能过剩行业中也有优秀的企业，应当采取差别的信贷政策；此外，金融机构流程优化也尤为重要。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金融机构的调整往往不那么及时，需要指导性的意见予以引导。

《意见》明确，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坚持区别对待、有扶有控原则。中国农业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森表示，这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有助于银行更客观理性地调整信贷结构，不搞“一刀切”，有保有压，有扶有控，促进化解过剩产能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防范风险维护资产安全

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的同时，《意见》强调要防范金融风险。董希森认为，加强风险防范和协调配合非常重要。“如果在支持工业经济中未能防范和缓解金融风险，将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也可能使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健康持续。”他认为，对恶意逃废银行债务和“恶意脱保”企业、个人形成强有力约束，明确地方政府在维护金融债权方面的责任等措施很有针对性，有利于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缓解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

2月15日，银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第四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2744亿元，较上季末增加881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67%，较上季末上升0.08个百分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连续10个季度上升，后续仍面临



较大压力。

在此背景下，《意见》强调，维护银行信贷资产安全。及时处置化解风险隐患，同时注意处置风险的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督促银行用足用好现有核销政策，加快核销进度，做到“应核尽核”。

下一步，《意见》还需要相关部门出台

更加细化的政策来落地。连平建议，如可以运用差别存款准备金工具，在新兴产业等方面投入较多的银行，可以适当降低准备金率；同时，各相关部门的政策之间需要协调配合，如货币金融和财税等政策可以有机结合，通过财政补贴与银行信贷结合等方式，为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提供适当的正向激励。

热评

严防金融风险交叉共振

陈原

农历新年伊始，工业企业就迎来了第一场“及时雨”。当前，加强金融对工业支持力度对经济发展全局至关重要，但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金融风险的防范需要各方更加重视。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在经济发展的历程中，金融都发挥了杠杆作用，撬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升级、科技的创新，以及经济高速增长。在此时加大金融对工业的支持力度，其积极意义毋庸置疑。

但如果在金融加大对工业经济的同时，未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将

使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可持续。尤其在近期各种金融风险事件频发的背景下，更需要防范多种金融风险的交叉共振，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对国民经济来说，工业是主导力量，是实体经济的骨架，也是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的主战场，对经济发展全局至关重要。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的同时，还应该把握好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这考验着监管者的智慧，也需要市场主体参与各方共同努力。

当前地方债风险总体可控

振法

正本清源 / 理性看

2月16日，河北省定向发行了350亿元地方债；2月18日，湖北省政府也将公开招标发行600亿元地方债……随着2016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序幕徐徐拉开，关于地方债能否顺利发行、风险能否有效防控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特别是在当前财政收支矛盾凸显的背景下，这一声音还有不少市场。

客观而言，这些担忧也并非全无道理。第一，未来地方债发行规模将明显扩大。2014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4万亿元。对债务余额中通过银行贷款等非政府债券方式举借的存量债务，将通过3年左右的过渡期，由地方在限额内安排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同时，今年我国计划阶段性提高赤字率，扩大赤字规模，新发地方债有望扩容。

第二，财政收支矛盾将加剧。当前，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已进入了个位数时代，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求扩大支出，收支矛盾扩大。

第三，中央不对地方政府债务“兜底”。为增强地方政府举债的自我约束，

判断地方债风险是否可控，需综合考察地方债务的总体水平和我国对防控地方债风险的制度安排。

◎ 2014年末地方政府债务率约为86%，低于100%的风险警戒线水平。

◎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地方债务规范管理的力度，多方面的制度安排，促进了地方债风险的有效防控。

防范道德风险，新的制度要求地方政府对其债务负有偿还责任，中央政府实行不救助原则。

但判断地方债风险是否可控，需综合考察地方债务的总体水平和我国对防控地方债风险的制度安排。事实上，我国地方债总体水平低于国际警戒线，风险防控制度安排科学合理，地方债风险防控问题不大。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地方债务规范管理的力度。2014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6%，低于100%的风险警戒线水平，风险总体可控。尤为重要的，自2015年开始实施的新《预算法》，赋予地方政府依法适度举债融资权限，建立起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为促进经济保持持续平稳发展，我国将继续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加大力度，对企业实行减税，并用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弥补收支缺口。地方债作为扩大赤字政策的一部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必须进一步实现规范化发展。

应该说，国家一直对防控地方债风险保持高度重视。除了新《预算法》以及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财政部还于日前发布《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做好2016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通知》，对地方债的风险防控提出具体要求。多方面的制度安排，促进了地方债风险的有效防控。

首先是科学合理设定地方债发行规模。债务危机往往源于规模失控，地方政府举债不得随意进行，更不能泛滥。我国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地

方政府的债务余额不得突破已经批准的限额。

其次是完善预算管理机制。强化预算的“硬约束”，将地方债纳入预算统一管理，接受同级人大监督，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债务收支情况随同预算公开的常态机制。落实偿债责任，督促地方政府统筹预算资金，偿还政府存量债务。

值得注意的是，对存量债务进行置换，有利于保障在建项目融资和资金链不断裂，优化债务结构，降低地方政府利息负担，但这毕竟是一种“借新还旧”的形式，最终有赖于通过地方经济发展和提高财力以实现偿还。

再次是强化风险预警。建立完善地方政府债务评估和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尤其是面临较高风险的地区，应制订中长期债务风险化解规划。同时，国家在新增债券安排时，应与各地区风险程度挂钩。

以上几方面的政策措施，是地方政府发债的“紧箍咒”，是地方债顺利发行、防控风险的有力制度保障。当然，防控地方债风险，还需在多方面发力。比如在保障民生支出的前提下，对一些不合理的支出要压减或取消，还要完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考核问责、政府信用体系建设等配套制度。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车伟：

应提高劳务类个税起征点

本报北京2月16日讯 记者苏琳报道：在今天举办的“2016年经济形势座谈会——聚焦：新常态、新改革、新发展”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表示，应对个人所得税实施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劳务类的起征点，减轻劳动者负担，“放水养鱼”。

张车伟认为，在劳动报酬份额偏低、劳动者工资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劳动者拿到的收入被进一步拿走的比例不断上升。个人所得税3%、住房公积金6%、个人缴纳的社保4%等等，整个加起来，劳动者本来应该拿到的工资当中有26%变成了不可支配收入。

为此，张车伟建议，个税改革当务之急是要解决税制的公平性问题。尽快实施个税分类征收，劳务类、经营类、财产类等。在分类征收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劳务类报税起征点，以减轻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负担，同时加强对真正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

他还表示，个税改革要在劳动报酬份额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推进，劳动报酬份额提高是我国经济转型和供给侧改革及提升内需的关键。